

中国现代哲学史

资料汇编续集

辽宁大学哲学系

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十五册）

抗日战争时期的哲学论战

（上）

主 编 钟离蒙 杨凤麟

一九八四年七月 沈 阳

目 录

今日中国的思想运动·····	立 民 (1)
思想革命与思想统一·····	罗敦伟 (7)
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	别 士 (15)
民族思想与精神国防·····	孙啸凤 (17)
民族意识与自由思想·····	曹立瀛 (23)
思想统一思想自由与思想斗争·····	艾 生 (26)
思想统一与思想自由·····	曲 沅 (31)
最近二十年国内思潮之动向·····	刘炳藜 (32)
研究提纲·····	艾思奇 (36)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梓 年 (77)
论辩证法的法则与方法 ·····	胡 绳 (82)
论质与质变诸问题·····	沈志远 (89)
形式逻辑扬弃问题·····	李 达 (102)
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	艾思奇 (124)
辩证法与形式逻辑·····	钱曼予 (133)
建立“民族哲学”的问题·····	天 放 (138)
再论建立“民族哲学”的问题·····	天 放 (142)
论学习和批判·····	钟 父 (145)
哲学·一八四〇——一九四〇·····	黄 特 (150)
本质·现象·内容·形式·····	刘 澹 (159)
论必然与自由·····	钟 父 (163)
论主观能动性·····	黄 特 (168)
自然·社会·动物与人类·····	光 明 (176)
哲学理论的生活应用例证·····	史 实 (180)
战争的辩证法·····	则 鸣 (184)
叶青反辩证唯物论的三部曲·····	光 明 (189)
地理决定论的研究与批判·····	胡 自 (193)
认识论上的两条歧路·····	潜 波 (199)
新哲学上的几个问题·····	刘 澹 (202)
略论生命·····	何 明 (206)
发展中山思想·····	黄 特 (209)
中国社会思潮的新倾向·····	孙啸凤 (214)
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的几个阶段·····	罗筱绍 (218)

今日中国的思想运动

立 民

文化思想或观念意识形态，决不是凭空产生的、玄妙的东西。反之，它们必定是某种社会基础结构的反映，即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不仅是随着社会基础构造的转换而递变，同时，对于社会关系的变革有时还起着推进的作用。所以封建社会有封建的思想，封建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社会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同时，正同社会关系的递变一样，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孕育着自我否定的前进思想。如果我们对于客观现实的发展不加考察，或者认识不清，那末，对于所谓思想，文化运动决不会有正确的理解。

文化思想运动既然与社会变革运动不能离开，那末，我们不妨肯定的说，近代中国文化思想运动，是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虽则是主导的一环。因之，要正确的理解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思想，就必须与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观察。最近，关于思想问题，颇引起朝野上下的注意，如新启蒙运动，思想自由运动，思想统一运动的论争，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新启蒙运动。所谓新启蒙运动，主要的是继承“五四”启蒙运动的精神，扩大民族自觉运动。我们要明瞭现阶段的思想运动，必须先对“五四”运动，略加考察。

二

“五四”运动，虽说是发生于一九一九年，为争山东问题而起，实际上这个运动并不是单纯的为了一个山东问题。“五四”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在开展中的民族自觉运动，是继续辛亥革命以后更进一步自我觉醒运动。两千年来，中国社会是长期的停滞在封建的阶段，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击了中国古老的封建堡垒，于是中国开始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由于新的物质变革运动的发展，当时中国布尔乔亚民主革命的要求和力量日见强大起来，并且一开始就挟着双重的任务：即反封建的民主运动和反帝的民族革命。由“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的酝酿，终于产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政府。但是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并且没有有效的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继续向中国伸进。由于当时中国市民阶级的过分稚弱，工农的力量单薄，而支持这个革命的主体的小资产知识份子，便轻易的和恶势力妥协了。于是政权便落在卖国的封建军阀袁世凯手里。他们尽量的向帝国主义去勾结、投降，并用种种威逼利诱的手段来摧残民众的革命力量。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我们的东邻，鉴于列强无暇东顾，凑巧，袁世凯又要称帝改制，于是便利用这个机会，胁迫袁世凯承认了二十一条。到了世界大战结束的

第二年（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会中，日本要将我国山东的利益全盘夺去。当时袁世凯虽死，政权仍在封建军阀的手中。和会中关于山东问题，中国交涉着着失败，于是便激发了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对于政治上的主要口号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在文化思想方面最有意义的工作，便是“打倒孔家店”，拥护民主政体和提倡科学工艺。当时的中心刊物——新青年杂志，曾有过不小的贡献。如反对旧礼教，反对旧伦理，反贞节，及文学革命，古史革命等都是五四运动光荣的贡献。

前面说过，决定文化思想的因素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五四”运动就是中国要求迅速推翻旧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表现。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封建军阀的乱政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于是再度加强了市民阶级反抗封建争取民主的革命要求，同时也负着反帝的任务。这次运动的影响范围之广，感人之深，力量之大，比辛亥革命更为出色。考其社会因素，不外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渐渐抬头。本来辛亥民主革命的兴起，便是新兴市民力量抬头的表现，但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民族资本的发展，随时都要遭极大的打击，在当时（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间）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发展而酿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牵动了全世界。列强为了自己的生存，自顾不暇，对于东方的侵略，暂时不能不放松一步。在五年中间，中国产业资本，便得到一个抬头的机会。生产指数不断的增高，特别是纺织工业更有突飞猛进之势。其他面粉业，火柴业等均极有进展，奠定了中国轻工业的初步基础。由于民族资本的抬头，要求完成民主革命的力量也日见壮大起来，然而当时国内外环境是那样恶劣，如封建势力的复活，复辟，复古闹得乌烟瘴气，而外侮迫压，日深一日。当时的政治力量不仅不能扶持民族资本家的发展，反而处处加以摧残，在在限制新兴势力的发展于是终于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在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但是我们却也不能无视它的缺点，第一由于支持这一运动的市民阶级的力量脆弱，和阶层意识的限制，所以，它虽曾经予国内封建统治及国外侵略者以无情打击而不能从实际中巩固继续反帝的任务，第二，它虽曾在社会、政治、文化方面对反动势力作过全面打击的工作，但因为不能把握现实的历史法则对于社会的变革，没有尽过继续推进工作，在这方面“五四”运动，留下许多伟大的历史任务给它的继承者。

三

可是，中国实践的跃进，使文化运动不能片刻停留。“五四”之后不久中国劳动运动起来了。中国历史上有了光绪的“二七”和“五卅”，中国思想界当然也起了激急的变动。新社会科学开始介绍过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更以觉醒的姿态出现，直到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这时中国社会的实践真是突飞猛进的发展，文化运动反而有些相形见绌，比较落后。譬如当时一般的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水准相当低下，便是一例。这光芒万丈的一代火花，终于不免流产。到了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间。中国文化界对于新社会科学的介绍，风起云涌，大量的译述，在文化工作上却曾尽了相当的任务。同时并引起了绵亘经年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展开了中国社会的自我批判运动，对于中国思想界，实有莫大的贡献。虽然，在智识份子方面，一般认识水平均见提高，有许多青年，思想上都受了新社会科学的洗

礼。但一般的说，文化思想还没有脱离混乱的状态。

四

“九一八”以后，中国民族危机踏入了空前未有的新阶段。中国正在加速从半殖民地沦为彻底殖民地的过程中。五年以来，已经丧失了百余万方里的国土，六分之一的同胞不断为奴役，被残杀，敌人的军队可以任意在我们领土上横行，敌人的飞机，可以在我们的领空上随便翱翔。并且在我们领土上强划伪组织自治区，武装走私破坏我国主权。厉行毒化政策和奴化教育，不使中国亡国灭种不止。我国民族工商业遭受帝国主义有政治、军事和经济多方面的加紧压榨，濒于破产。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总崩溃的危机，大多数的人民都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因此，各种对内的斗争，政党的斗争，阶级的斗争，便一致转为直接和敌人决斗的对外的民族斗争。我们有过了淞沪长城的英勇抗战，义勇军的光荣牺牲和全国民众反×的高潮。这个民族斗争的实践，反映在文化思想上，便使文化运动掀起了一个大飞跃。由白话文大众语的论战，到拉丁化的新文字运动，和通俗化运动，大众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最后产生了当前的新启蒙运动，思想自由和思想统一运动。

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是以去年九月十日《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陈伯达先生一篇《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家的自己批判》和《新启蒙运动的建议》）开始意识的提出来的。陈先生感到“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的缺乏有系统的深刻批判。而这种数千年来的统治传统思想，目前却正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用来奴役中国民众意识的有力工具，并反省到：“中国新哲学者，大部份（即使倾向是很大的）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的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好好的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因此“理论从实际中游离出来，就更加加强了理论的落后于实际”。于是他提出了，“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前面，哲学上的斗争，应该和一般的人民斗争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最后，他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为实现这个纲领，他以为应该进行以下的工作：

一、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

二、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

三、阐发帝国主义者在华之文化侵略，以及中国旧礼教如何转成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人民的工具；

四、有系统的介绍西欧的启蒙运动及其重要著作，介绍世界民族解放的历史及其理论；

五、大量介绍新哲学到中国来，并应用新哲学到中国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去；

六、在各地经常举行哲学的公开演讲会，辩论会。

七、帮助民间组织广泛的“破除迷信”的组织，组织各种式样的无神会。

八、和世界的文化组织，思想界的名流，发生关系，请求他们不断地援助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援助中国人民的启蒙运动。

九、组织百科全书委员会。

以上的各项工作，应该根据每个参加者的能力和兴趣，实行分工合作。而新哲学研究者应该站在这运动的前头。

此后陈先生接连发表四篇讨论新启蒙运动的文章，他更强调的说明了这一运动的社会因素。他开始从事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的阐释。他把新哲学的否定之否定律，应用到中国社会运动史上，以辛亥革命为中国民族自觉运动的肯定，以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为否定，而以九·一八以后的民族抗战和爱国运动之否定，他说：“一九一五年——二七年大革命的分裂和失败，使民族的情势来了一个逆转，造成了空前未有的‘九·一八’民族大惨案。‘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失掉了三分之一的领土，而且在日益深刻地遭遇着民族大破灭的危机。在这里文化上的黑潮的卷土重来，是民族情势的逆转的一方面的反映。签订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当年所提倡的复古，尊孔，祀天等等，随着年来国土的拱让，竟有力地抬起头来，在各地喧扰着，招摇着，而我们的侵略者和种式类的汉奸，也都是一致地以复古向我们同胞号召着。侵略者和汉奸称伪国为‘王道’乐土。——又有了对天真的儿童和纯洁的青年提出了‘盲从权威’和‘迷信独断’的口号来。某些哲学的著作，充满了神秘主义，贯串了神学，我们文化，正在遭逢着被毁灭的危机，我们必须唤起全民自我的醒觉”。

新启蒙运动，就这样意识的开始，随后艾思奇先生《在生活星期刊》的双十特辑和《文化食粮》一卷一期先后响应，并提出了补充。柳湜先生的国难与文化也问世了。总之，新启蒙运动在分析近代中国思想运动的劳作上，是相当正确，相当成功的。不过在倡导者方面，理论超越了实践，使这运动不能广大的展开，同时却遭致了许多非难和误会。

事实上所谓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并不是十分民主的。工作的范围也太广泛，在抗敌工作十分急迫的现在，有些不十分急切必要的工作是不妨暂缓的。虽然他曾一再由说新启蒙运动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事实上不脱关门主义，譬如陈先生说：“新哲学者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哲学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这样便使许多所谓中立者敬而远之了。

五

在北平首先响应新启蒙运动的是张申府先生，但是立刻便引起杨立奎的通电反对。以为新启蒙运动者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全民族的自觉运动应该广泛联合，但事实上仍不脱宗派主义的藩篱。并以为这种宗派主义的思想，等于拆散全民抗战的思想统一阵线，削弱整个民族抗敌力量。这两方面的思想斗争闹得轰轰烈烈，正反映国难以来人民对客观方现实认识的分歧，一般中立者对于左右两面的“浮浅、窄狭、与独断”感到压迫，表示了抗议。例如朱光潜先生在四月四日《大公报》星期论文所发表的“中国思想的危机”，说：“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思想上现在所能走的路只有两条，不是左，就是右。决没有含糊的余地……政治思想在我们中间已经变一种宗教上的‘良心’，它逼得我们一家兄弟要分家起来，思想态度相同而其余一切尽管天悬地隔，我们仍是同路人；一切相似而思想态度不一致，我们就得成仇敌；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感到这种不能不站在某一边的严重性是一种压迫”。这确是十足代表了一般所谓中间层自由的思想者的苦闷。这里固然说明了所谓自由主义者的本质，对社会斗争的尖锐，没是体会，同时，这种思想上的对峙和斗争，对于民族第一主义的大联合运动确也是一种妨碍，特别对于大多数的中间层的确是一种压迫，如朱先生所说的思想的危机，第一是，

没有思想，“误认旁人的意见为自己的思想”；第二是思想的自由被剥夺被垄断“结果就只能学会不思不想，以耳化脑很恭顺地做野心政治家的工具”，而“信仰某一派政治思想而抹杀一切其他学派的政治思想，甚至于以某一派的政治思想垄断全部思想领域，好像除它以外就别无所谓思想”，于是“青年大多数被迫压进去过量的固定观念与陈腐反应而失去思想所必需的无偏见，灵活，冷静，与谦虚”。这些确是中国思想界不好的现象。因此，他要求人们慢谈“右倾”和“左倾”，他说明思想上只有是非真假，而无所谓左右。他要青年多怀疑不盲从任何派所谓“领袖”，要大家明瞭思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以及思想如必有的态度与方法，因此他提出了“自由研究”“自由讨论”。

无疑的这个自由思想的要求，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特别在北平晨报上更有过有力的补充：“北平文化界的人们已完全陷于代言人的地位，不是代甲派发言，就是替乙派工作，不是替政府宣传德义，就是替反对者泄露意志”。这点说明了所谓思想上的对峙和斗争，完全是根据不同的政治立场的思想斗争，彼此争取民众的拥认，要求领导大多数右不左右不左，可左可右的民众。实质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斗争。可是，在现阶段的国中，政治上一切对内斗争已经统一于民族抗战的大目标之下，思想界如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同的中心，实在是很可惜的事。

因此，统一思想呼声，就趁势抬头了。针对着朱光潜先生的自由思想要求，狄超白先生在《新学识》上发表了一篇如何消灭思想上的对峙的文章，主张以统一思想来消灭思想的斗争。接着《北平晨报》发表了关于文化界应该合作的社论。六月五月，陶希圣先生在《世界日报》又发表了“息争”的论文，文化界合作的空气渐渐浓厚起来。对政府方面。陶先生说：

“政府如能给予各种倾向的思想家，青年和壮年以充分的言论自由，使他们能公开讨论国事，贡献意见；如能集合各种倾向于一个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之下便可以化斗争为合作”。

在另一方面，他说，“青年训练也有改正的必要，能够指导青年的人们断不可因袭从前的旧手法，每日刺激他们以明争的气焰向异己的队伍，施展打击的本领。”

六

由上所述，所谓思想上的斗争本来即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立场的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一种主要的斗争手段。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而政治立场并不十分鲜明的所谓中立的知识份子，便感到双方的压迫而喊出了“给我自由”的呼声，更是必然的事。我们认为思想上的对立，是促进社会进化的推动力。我们承认思想是社会的产物。在有阶层的社会里，思想自然有阶层性，何况在无阶级的苏联，思想尚有所谓党派性。所以思想的对峙，是勿庸设法消灭，也无法消灭不会消灭的。现在思想上的大危机，不是思想的对峙，而是根据某一政治立场用各种力量要求别人盲目的信仰，这才是危机。我们知道中国人已经一致放弃了各种各样的内争。民主空气也渐渐浓厚起来。执行阶级斗争的政党，都已暂时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政治手段（注意：并不是放弃政治立场）集中力量在一个大目标之下。在抗敌救亡民主政治之下，我们不能再利用思想上的对峙，来作政治斗争，消损整个民族的抗敌力量。我们所要致力的是民族抗战思想的唤醒和训练。反侵略反汉奸，才是此时此地思想运动的最大目标。各阶级层各党派对峙的思想立场，都不妨暂时保留，仅仅在这个反侵略反汉奸的共同目标之下携起手来。所谓思想统一，必定要是反侵略反汉奸的思想统一，所谓思想自由，更不能超越

这个范围，总之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大目标之外要求遂行某种政治野心，消损整个抗敌力量的“自由思想”，和“思想统一”。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曾经明白的指出文化思想运动，完全是政治的反映。但是他们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的脉搏，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政局的新转向和外侮加紧，不能不说没有正确的把握着。今日的文化上的对立，只有侵略者和汉奸阵线与民族解放的联合阵线的对立，是绝对的对立，不能调和的。此外，不同的社会层，不同的学术团体，学术上不同的宗派等都应该暂保留他们各自己对于中国将来的意见，在这个主导的对立下面，在对付共同的敌人时，取一致的行动。

前面说过所谓思想统一，固然绝不是压迫反侵略反汉奸的思想。同时所谓思想自由也不是在反侵略反汉奸之外要求遂行政治斗争的自由，我们要争取的不是少数个人思想自由，而是大多数在异族和汉奸压迫之下的同胞们的整个自由啊！我们知道，东四省的同胞现在只有做奴才的自由了，我们的文字在东北，都要受到迫害，日文已经成为小学的必修科，一切有关民族意识的思想都在迫害。今日的华北，许多大学校已感到国难教育在平津已难实现。言论出版毫无自由可言，敌人可以随意命令某种刊物停刊或封闭，强制某一日报改组。敌人的文化侵略比军事侵略可怕，它可以通过汉奸的手，更广泛的执行。这个比起国土的被侵夺，要受到其他帝国主义的牵制要厉害得多。而国内封建残余，也正有意无意的与敌人呼应，如读诗经、存文、愚节、愚孝、迷信的提倡，闹得乌烟瘴气。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之下，我们应该暂时牺牲个人的或宗派的立场，在反侵略反汉奸的大目标之下，集合一切力量，协助政府，代表整个民族来争取广大的全体的民族自由。个人和团体的自由，是要先争得民族的自由才有可能。政治斗争如此，思想斗争，又何尝不应作如是观呢？本来一切思想运动，必然是采斗争的姿态并且与政治斗争不能分开，“五四”和“新启蒙”都不出这个范畴。不过现在政治的环境与“五四”时代大不相同，一切内部的斗争都在为整个民族的斗争里统一起来，思想上的壁垒也应该一致枪口向外。

七

诚如四月五日大公报社评所说：“现代国家，政府国民，本来不应该对峙，矧在中国建国事业，经纬万端，救国需要急如星火，上下融合且恐无济，再有分立，宁分速亡。”因此我们认为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之下，一切对内的思想斗争，都应该融化在反侵略反汉奸的目标之下。根据这个原则，由政府来加以适当的统制。这里所谓统制当然不是指压迫民族解放的思想言论，而是取缔汉奸言论及一切不利于民族统一抗战的思想，譬如读经存文盲从迷信以及“左到海里去”的言论之类。其实所谓统制并不是一个坏的名称，正如一切好的名词一到中国就变质一样，“统制”两个字，久已被人误解。实际上所谓统制与专制是绝然不同的，专制以主观偏见为依归，统制则以客观的纪律为基准，前者为反法治的，后者为法治的，即就民主政治而言，近世民主主义学者罗维尔氏曾说过：

一国民族种类之复杂，尚不妨害国家政见之一致，惟国民全体对于普通政治问题，无统一的意见，则万不能行民主共和政治。

我们所主张的统制，便是根据这种法治的民主的原则。用意是要加强整个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集体的反对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言论思想的无耻手段。所以思想的统治和政治的民

主是不可分割的。

最后，我们还想提到最近文化运动中一般无耻的奸细。他们凭着好高骛远的有害的空想，对各方面横施攻击，明枪暗箭，企图破坏抗敌的民族阵线。他们一方面拚命的无的放矢的攻击所谓“左翼”，当然这无非要表明他们的意见比之所谓“左翼”更要“左”，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老牌“左翼”，只此一家并无分店的。他们似乎是只有热血而不懂战略，只懂公式没有方法的。他们口口声声说“在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不要求解放则已，要解放就必须斗争”，但是怎样斗争呢？他们没有具体的说明。原则上他们是要以坚决的态度，绝对反对一切和平运动，（譬如太平洋集体安全运动），彻底的反封建，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这里我们特别要郑重地附带的指明，这种看上去很前进的思想，实际上是最有害最可怕的不着边际的空想。这种空想，对于目前的整个民族解放运动，不仅不会有丝毫帮助，正相反，它是破坏当前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支暗箭，大家要提防着。这种有害的思想，正同读经，迷信一样，都应该在统制之列。

（原载《中国社会》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七月出版）

思想革命与思想统一

罗 敦 伟

一 导言

近来有一种思想革命运动，认为中国的思想界，应该再来一次五四运动。把当前的思想，加以革新。还有一种，即是我们提倡的思想统一运动。认为在现阶段，我们展开民族生存斗争的时候，一切的思想，应该合流于民族复兴运动。展开我们的“民族第一主义”。因而主张思想统一，并且主张文化应受统制。把盛行一世的经济统制主义，也移植到文化界思想界上面来，本来上述的两个运动，也可以互相合作，而抵于一成。可是就现阶段客观情况说，彼此是相反的。

在这个相反的两个运动展开之下，我不想去辩论谁是谁非。而只想根据当前中国的需要，和当前我国客观条件国际环境的情势，去判断一个何者与现实适合，何者是离开现实，甚至反对现实，陷入乌脱邦主义的中间。换言之，即是现阶段的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期，随时随地可以亡国灭种；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最有希望的时期，随时随地可以求得民族的复兴，这样一个大时代，每个国民的任务，都非常之大。尤其是思想界的文化人们，更具有伟大的责任。古人所谓“载舟覆舟”，即是今日中国的存，亡；兴，败；完全看我们的努力如何。我们如果能够一致努力共同迈进，自然可以展开我们民族的斗争，而获得最后的胜利。反过来假定我们还在唱什么高调，憧憬着一些离开现实的理想，去主张思想革命。搅乱我们一致斗争的阵线，展开内在的斗争，毁灭对外斗争的威力。那末，一方面摧毁了民族生存斗争的胜利基础；另方面无形中间作了帝国主义的汉奸。使帝国主义不必用一点力量，而实现了（文化围剿）的企图，获得意外的胜利。因而我感到当前的思想问题，不是

一个主观上所谓“是非”问题；而是客观上的“利害”问题。有害于民族斗争，摧毁民族斗争的力量，替帝国主义作文化围剿的前锋的主张，即在主观上无论如何的合理，无论如何的高超，也是应该反对的。——这个斗争，是当前思想界的一个最有价值的斗争。严格的说来，当然也不仅是单纯的思想界的一个最有价值的斗争，简直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表面上看来是思想界内在的斗争，实际上简直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个斗争，何等的英武！何等的伟大！

二 思想、文化与客观条件

许许多多的庸俗的学者，以为思想，文化，是随便可以用人为的力量去建立的。甚至以为我们鼓励一种思想的革命运动，即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思潮，是由人为的努力可以建立的。

“五四”运动过去了，没有建立一个新思潮；应该再来一个五四运动。本位文化运动过去了，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民族文化，应该再来一个新文化建立运动。仿佛思想，可以随心所欲；文化可以“本店自造”，祇要有勇气打出一块招牌，即可以大胆地出卖思想和文化。其实，思想和文化，那里有这样简单。

按照“民族史观”的哲学，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是依存于社会问题。所谓社会问题，当然是客观的。思惟也何尝不是依存于客观的真实。因而我们可以判定在民生史观之下，思惟的道路，决不是一种玄学主义的道路，以为思惟是根据理想；更不是僧侣主义的道路，以为完全是唯神的。客观事态的展开，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由社会问题不断的变动，形成各种各样的客观事态的变动。反映到各个人的主观方面，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唯物辩证法论者，虽然不了解我们民生史观的真谛，可是在第一观点上，他们也有许多理解，和我们相同。例如列宁对于思惟的道路，也曾如此的说过：

人类的认识，不是一根直线（也不是描画一根直线），而是无限地接近于环境的体系，于一个螺旋的一根曲线。这根曲线的各碎片，各破片，各断片，能够转化（能够在一方面转化）为一个独立的，全体的，直（线）。像这样的线，如果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那就坠入泥沼之中，坠入僧侣主义（这些东西，在那里是和支配阶级底阶级的利益相结合的）。直线性与一面性，无生气的事物，与化石的事物，主观主义与主观的盲目，在那里就有观念论底认识的根源。但是僧侣主义（等于哲学的观念论）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并不是没有地盘的。他无疑的是一朵虚花，但是有生命的、多实的、真实的、充满了力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底有生命的树木之上开出来的一朵虚花。

上面列宁的见解，当然也算有一些见地。虽然还嫌浅薄一点，也可以为我们解释民生史观的客观与思惟的联系的一种参考。思惟与客观的存在，既有如此的关系，可见思想是不可以任意树立，而是应该研究客观的真实，去判断思想的是非。

再说到文化，也是一样地和客观有密切的关系。日本学者板垣鹰穗说：“文化的诸相，大抵都被装着他的称为‘社会’这个器皿之样式，所拘束着。”这个，是就文化论，他的诸相，是被社会所决定的。法国批评家泰纳Taine认“文化，是‘人种’，‘环境’及‘时代’之各种背景所构成”。我在前年四月讨论本位文化的时候，对于文化更有一个新的见解。当日我曾经有如下面的说法。

文化的本质如何，各家的意见绝不一致，斯托克Storck说：“文化就是一个社会所表现的一切生活活动的总和”。波克洛夫斯基M. N. Pokrowski说：“文化是与自然不须我们劳动而

单祇给予于我们的东西不同，它是由人类的劳动造成的东西之总体。”列宁说到文化的时候，特别着重“生活样式”。以为文化一定要与实际生活发生联系。假定我们不是玄学论者，我们对于上述两个文化的定义，一定比较赞同。但是我个人以为对于文化本质的说明，上面两种说法，还祇能解释到“静止”的方面，不曾解释到文化的“活动”方面。因此，个人以为应该更进一步观察文化的本质。所以我以为文化的本质，不仅是人类因生存由劳动进成的一切成果之总和，而且应该包括人类向上与前进的活力。因而文化的本质应该是——

人类因适用环境需要用劳动所造成的一切成果之总和，而同时是人类向上与前进的活力。换句话：即是以生活为基础的血与肉的文化。

照我上面这个观察，第一是由以精神为重心的文化到以物质为重心，当然包括精神的物质文化。第二点，由静止的文化到具有向上与前进活力的血与肉的文化。我国一切落后，走到没落的途上，尤其需要这种解释。

上面这样的一个思惟的道路和文化本质的解释，的确是相当的正确，尤其是血与肉的文化与具有向上动力的文化，——这个虽然自我作古，可是的确有特殊的价值。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知道，今日的思惟道路，决不能离开当前的社会问题。而当前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即是民族经济的崩溃。而且是民族经济的总崩溃。如何挽救民族的生存问题，即是今日思潮的主流。文化既然是血与肉，所以一切文化的运动，不能离开整个民族的血与肉的危机。因而我们可以知道今日的思惟和文化问题，不是主观上的真实与否问题，而是客观实践上的真实与否问题。客观实践上的真实，才是思惟和文化的真实。

三 思想文化的统制

当前客观的真实，是一切需要统制。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实行文化统制政策，不仅左翼作家反对，恐怕所谓（第三种人）也要提出抗议，而自由主义绅士派的所谓作家，也会要祭起言论自由的老祖宗向我们为难了。所以我们必需首先讨论文化统制政策的本质。

一、文化与政治 左翼文人，常常高唱国家用政治力量干涉文化事业，为文化的危机，似乎忘记了，苏联不仅用政治力量，党的力量统制文艺，统制文化，而且把文化政策，文艺的斗争，作为扩大阶级斗争之一，左翼作家有下面有力的名言。

“为我们文学理论的正确发展的决定条件，是摄取列宁的理论的遗产于这领域中间。…只有为文学理论及无产阶级文学的列宁主义的斗争，才是最重要的当前的任务。为文学上列宁主义的斗争，有摄取和研究蒲列哈诺夫给与这个问题的东西的必要，同时，和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列宁的阶级的见地，批判他的缺陷和谬误有密切的联系。”

“哲学及科学的党派性的列宁的原则，和现在的发展，阶段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对于向社会主义期的进展的情势下的文学的无产阶级运动也可以适用，且必须特别着重”。（《为创作的方法的唯物辩证法的争斗》）

藏原唯人也说过下面这样的话，表示文学的政治性，把政治的使命与文艺合并起来。你看他说：

“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必须作为由无产阶级斗争的实际的辩证法底地加以统一而认识。同时，必须使其辩证法的差别及现在的阶级的政治的指导的地位弄明白。”（《艺术社会学的的方法论》）

由上面二段左翼作家的名言，及列宁主义的文学论看来，可以知道左翼文人诋毁意大利，德意志干涉文艺，用国家的文艺政策，而忘记了自己的本来的面目了！

二、统制与自由 上面所说的不过是就左翼的理论来“以毒攻毒”地告明左翼作家。至于绅士们也应该了解所谓民主政治，当然不是纯民主而没有政治。民主既与政治联合起来，即是告诉我们这个不过是政治制度之一种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有政治即有权力，有权力即有干涉。民主政治最重视有机的发展，那末，决不能容许文化的活动离开政治，甚至违背政治。欧美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对于文化的建设也特别的注意。表面上虽然维持言论，著作，出版的自由，实际上对于立在政治轨道以外的言论思想，仍在禁止之列。我国的文化现已低落到不可收拾的境地，而另一方面反民族主义的文化运动又闹得思想界乌烟瘴气，如果再取放任主义，将来的结果，非到民族主义完全破产不止。急早来实行统制，正是我们用政治力量来协助文化的一个正路。

并且，所谓统制并不是没有自由，根本与言论，著作出版自由，并不相冲突。日本统制经济的学者武田鼎一氏即认为统制经济正是自由的，不过是真正的自由，而不是放任的自由。

（《统制经济之基础理论》）那末我们的统制文化真正的自由决不是没有的，不过不是放恣的自由罢了。那是统制文化的自由，是正常的自由，是应有的自由，而不是放任的，浪漫的自由。

三、次殖民地文化的危机 或者有人说，文化一经统制，思想即不能进步，学术也没有方法昌明，正如汉以后定儒教为一尊，致南北朝的时代为中国黑暗时代。那末统制文化，长是将成为文化的罪人吗？这个也不然，要知道一个国家文化的进步，固然需要自由，可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外国势力支配之下，在人家政治力量支配之下，如果不用政治力量来抵抗他，自己图文化的复兴，又有什么方法呢？看吧，现在中国之所谓学者，作家，以及文化界的领袖。到底足以配称真正的学者，作家及文化的领袖吗？我这话也不是骂人，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的学者中间，十个中有九个祇是懂得一点外国的学问，而不懂得中国的学问，自命为了解中国的学问的学者，又不过是封建馀孽，不懂得现阶段中国的需要。自命为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上焉者，不过是贩卖些西洋学理，或者邀一二外国学者到中国来，如玩马戏滑稽演说，当当翻译；而下焉者更不过是利用社会上的空虚，纯盗虚声，借文化事业，文化经费以谋生活。出版界更是可怜，十本著作中间，有九本是直接或间接的抄袭外国的，而十本中间的一本，幸而讨论到中国学问中国问题，也不过是根据外国的学理说话。真正能独辟蹊径，能够在学术上有特殊贡献，可以谓之绝无仅有。所以有人说在中国学者中间，论旧学，或者现在还有一二人，论科学，那末中国完全没有一个学者，没有一个真正的学者。固然，我并不敢一笔抹杀说没有一个，可是至少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的学者不过是懂得一点皮毛或拾得外国人的牙慧罢了。

至于说到懂得中国的实际状况，真正需要的，那末，更是难乎其难，中国是以农立国，而真正合乎中国农业需要的学问在那里。土地问题，水利问题，有什么人懂得，真正的懂得，——在这样情况之下，如何谈得到学问，如何谈得到思想的自由，更如何求中国和民族的复兴！

可是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排外，拒绝外国学术之流入中国，我们是认为如果不建立民族科学，民族思想文化民族的劳苦大众思想文化，本身文化破产，而专门去吸收外来的文化，结果，是建立了一个殖民地的文化。不论是左翼的文化也好，右翼的文化也好，终于是个没有灵魂的文化，而是亡国的文化。固然也有人说学术思想是没有国界的，可是要知道在

民族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如果你本身文化破产，而专去学他人的皮毛：吸收他人的文明，结果，不仅不能造成新的文化，连旧的文化也要毁灭，国家和民族，自然也跟着走上了毁灭的道路。前途多么暗淡，多么危险呀！不幸得很，中国现代的文人，学者，作家，以及文化界的领袖，还是踏着黑暗和危险的轨迹前进，而自己并不知道危险和黑暗！假定在这样的外国政治的或经济的压迫之下而去不知不觉的建立次殖民地的文化，何能再唱什么高调，而反对国家的统制呢！

以上三个问题讨论过了。我们即可以知道：一，共党不能反对我们的思想和文化统制，因为他们的祖国（？）也是行文化统制的！二，第三种人，应该了解中国目下的文化，已经走入了次殖民地文化的前途，不能不需要政治的力量，一方面建立民族文化，一方面抵抗侵略文化，这个即是我们主张文化统制政策的政治基础。也就是我们主张文化统制政策的政治理论上及政治事实上的根据。也可以概见，我们主张民族文化的统制政策，消极上说，似乎是反普罗文化运动。其实我们的意义是积极的，即是我们重在借重政治权力的协助，扫除一切次殖民地文化的运动，要立定统一的举国一致的思想。建立新的有灵魂的血与肉的民族文化，民族的劳苦大众文化，不仅要阻止文化运动中间的次殖民地的倾向，而且引导所有的作家，学者，以及文化界的领袖，都在一个统一的趋向之下，一个共同目标之下，共同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而努力。

四 当前文化运动应有的趋向

上面先把思想文化与客观条件及统制问题，交代明白了，现在可以再进一点研究当前的文化运动的趋向问题。即是：

- 一、思想文化的革命问题；
- 二、思想文化的自由与统制问题；
- 三、思想文化运动的新路线；

首先来研究思想文化是不是应该革命。一种思想或者一种文化，并不是人为的意识可以自由的形成。必然的要经过佛家所讲“生”“住”“异”“灭”的四个阶段，即是：第一，萌芽时期（生），思想文化的发生时期；第二，全盛时期（住），思想文化完全立定了，站住了。第三，变异时期，发生了不能适应客观事态的现象，不能不有另一种文化的孕育。原有的自然变异了。第四，为消灭时期，新的思想文化再行产生。可见思想文化之立定，一定要经过相当的长时期。且有一定的条件。现阶段的中国，自辛亥革命，中经一九二五——二七年北伐时期大革命，一方面是政治改革，同时也是思想文化的改革。所说成长期的文化界，对消灭期的旧文化已经有了多次的强烈反抗。可是这种对旧势力的否定运动，并没有得到一定的成功。所以新的文化迄今没有建立起来。一般人们下焉者过着买办乃至汉奸式的帝国主义者的奴役生活。上焉者打着自由主义的牌号，反抗民族力量的统制运动。民主政治是资本政治，自由主义乃资本主义的产儿。这种反民族统制运动的文化人，表面上是反汉奸，反奴役，反帝，甚至还高唱为民族抗战，但是他们误入了帝国主义自由民主的圈套，实际上作了文化上思想的汉奸、奴役，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因而新民族思想及民族文化的建立，不能急速的成功。自九·一八以后，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疯狂似的进攻，生与死的决择斗争，已经布满了全国，每个人都怀着为民族争存的热望。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了共同的认识。只有共产党和有左

庸俗之流，一方面提出民族团结共同抗战的口号，一方面又提倡自由，反对统制，拆散民族抗战的团结力量。最近所谓“新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是那末一套矛盾的老调。美其名曰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不如说是一种反民族文化的阻碍运动。以民族救亡为面，而以民族速亡为里，实在太危险了。话又说回来，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民族革命运动，自九·一八以后，才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础，才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假定再来一个革命运动，祭起帝国主义的法宝——自由主义，来拆散民族抗战民族救亡的阵线，实实在在来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影响所及险毒险狠，比殷汝耕一流的汉奸，实在没有两样！虽然他们的出发动机，或者是真心救国，但是事实上影响却是不可饶恕的！

其次，再说到自由与统制问题。思想文化之可以统制，上节已经说明。现阶段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民族生与死决择的最后阶段，当然需要民族一致团结对外抗战，自力的救亡图存。——“战争是一种实在，在民族生命中间是一个最严重的实在”（鲁登道夫Von General Ludendorff的话）绝对不是空口说白话所能做到的。必然的需要一种实在的力量。这个力量，包括到各方面，物质的乃至精神的。鲁登道夫曾有几句名言：

一个国家的国防力，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民族当中，国防力是民族中国的一种成分。视其民族的物理力，经济力及精神力之大小，而决定全体性战争中的国防力之大小。就中最重要的，即是精神力。因为民族武力一致团结，更靠精神力；在全体性战争中能支持日久，也更靠精神力。这类战争，不是今天开始，明天可以终结，常常迁延到极长的年月。今日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知道军备与军人教练军人武装之不可缺，但是决定民族战争的胜败，还是更靠精神力。祇有这个精神的一致团结，然后其国民对于前方军队常有新精神力之灌输，且为国防而工作，而能在艰难的战争中及敌方的攻击中，还存有战胜与克敌的决心。”

民族救亡抗敌御侮，思想上当然重在团结一致，如在一方面说：“我们现在需要组织全民族的抵抗，来挽救民族大破坏的危机，我们必须唤起全民族的觉醒”，另方面却说我们要“自由研究”，“自由讨论”、“自由主张”。请问，世界上那有在一个斗争的当儿，而能还自由讨论，自由研究，各自主张，可以获得胜利的！这样矛盾的主张，居然显示在中国当前的思想界，出版界，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本是资本主义的产儿，醉心自由主义的人们，都是中了资本主义的毒。资本主义在成长期中，以自由主义相号召推翻封建政治，推开商业资本主义制度，成功以后，又用自由主义去粉饰太平，去笼络劳苦大众，去作为榨取劳苦大众血汗的护身符，这是凡懂得民主政治精髓的人们，所周知的。而在一个期以斗争的姿态，达到复兴的国家，绝对不能不放弃自由主义。假定不放弃自由主义，也绝对的不会能够争取斗争的胜利。首先认识这个的是苏联，再为意大利，再则为德国。近年来准战体制之下的各国，差不多都抛弃了自由主义，倾向于苏联，意大利，德国的统制主义。在这样一个否定自由主义的时代，提倡自由主义，已经时代落伍，再加上和民族斗争联在一起，自然绝对的不通。不过，我们并不以为反对自由主义，即可以为止，即可以应付民族的危机。我们是以为应该进一步，提倡统制主义，才可以完成时代的任务。

最后，我们讨论今后思想文化运动的新路线。

第一，建立“民族第一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时到今日，民族危机达到了顶点，居然还有人谈“左”、“右”问题，甚至还以为思想和文化不左倾及应该右倾。如朱光潜先生在大公报中国思想界的危机一文上即如此说过：（廿六年四月四日星期论文）“中国知识阶级在

思想上现在所走的路。祇不两条，不是左就是右，决没有含糊的余地：…政治思想，在我们已变成一种宗教上的良心，它逼得它们一家兄弟要分起家来。思想态度相同而其余一切尽管天悬地远，我们仍是同路人：一切相似而思想态度不一致，我们就得成为仇敌。我们中有许多感到这样不能不站在某一边的严重性，是一种压迫。”朱先生真是慨乎其言之，这个真是一种胡闹。其所以如此，不入于左，即入于右的压迫，是怎样构成的，换言之，何以胡闹到如此境地，即是因为没有树立中心思想，假定我们根据我们共同的认识，不再奴役似的作文化上的汉奸，我们即可以树立民族第一主义之思想和民族第一主义的文化。

不久以前，我在《前途杂志》上写过一篇《思想斗争与民族斗争》一文，主张树立民族第一主义，曾经这样说过：

“中国民族的危机，现在无疑的已达到了顶点。当然应该走‘民族第一主义’的道路，思想界如果再来分散民族阵线，无论他所标榜的理论如何高超，结果必致促成民族的灭亡。所以在现在无论是国际主义也好，世界主义也好，阶级斗争也好，唯物史观也好，一切的好听名词，姑不论他与现在中国的客观条件是否适合，即就民族的危机这一点说：如果不把民族自帝国主义者的手中救出来一切的一切都是亡国灭种的理论。在现阶段世界上两大横断面的斗争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许许多多的纵断面，国家的自存运动，决不能否认。苏联的国策，不能不回到国家主义的姿态底下，尤其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大家知道苏联是一个思想左倾的国家，可是事实上近年来权力趋向实利主义。造成‘学术的党派性’。种种新的理论拥护党和政府的利益。而不拘泥马克思昂格斯的主张。即可以知道思想与环境应该绝对的联系，今日的中国，民族自救是第一义，所以思想界应该群趋向这一途上面。”

上面那段话，很引起日本思想界的注意，目为是中国统一运动第二阶段代表的言论。《外交时报》五月号，而且有专文批评我那篇文章，甚至还骂我为“南京御用的理论家”。大家都知道我是绝对没有除国民党外的政治背景的，更不知道什么叫“御用”。但是我深深地感到，此刻我们全国上下已经认清了我们的危机是什么，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我们的路线当然，也祇有团结民众一致对外抗战，对内求生存。正好树立民族第一主义来统一我们的精神力量，充实我们物理的经济的条件。求民族的生存。民族第一主义的树立，是一条思想界，文化界最正确的路线。

第二，是新铁血主义的统制姿态。这个新铁血主义的统制姿态，是今后思想界的根本基调。关于新铁血主义，我已写过好几篇文章。当然不是狭义的铁血，更不是黷武主义的血铁主义。新铁血主义是说“铁”即是物质的国防建设，“血”即是精神的国防准备。今后思想界应负起两个大任务。第一是推进精神的文化建设。第二是推进物质的经济建设。前者即是血也即是“新生活运动”。后者即是铁也即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理的心理建设与物质建设，也就是这个铁则。不过，我们因时代和环境的展开，应该更用一个崭新的姿态，对于两大建设为有力的推进。思想界如果负起这两个使命，必可扫荡中国自私自利，萎靡不振的精神，在思想上完成现代化。

推进上面两方面的建设，必须走统制道路。固然，国内还有不少一知半解的人们，以为条件不完全，不能行经济的统制。可是我们如果有科学的头脑，即可以知道现代的国防，重要是经济国防。蒋委员长说：“所谓现代国家，从国防的观点来讲，并没有其他的特质。不过全国人民，与各部门各种类事业，乃至一草一木，已经依科学的方法，有了精确的调查统计与组织配备，一到战时，可以依据预定的计划，将全国的人财物力总动员，来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罢了。”今日民族复兴，必须走经济建设的路，毫无疑问。而以中国建设力量的薄

弱，帝国主义对我经济侵略力量之庞大，即是所谓“条件不够论”。那末，与其用自由主义散漫的去建设，当然不如用集中的统制力量去建设来得有力。大家祇误解统制经济建设的条件不够，更不知此种条件之不够，对于自由主义更为强烈。根本反对经济建设，是根本不懂现代的斗争。所以主张国防而反对经济建设，是等于先缴自己军队的枪械而驱使他们徒手散漫的各自上战场——这种理论，集荒谬神奇之大成，当然无讨论之价值。所以我们必须用统制的力量去从事一切直接间接与国防有关的建设，也就是整个的经济建设。

希脱拉说：“吾人复兴德国，不在如何制造武器乃在如何制造精神。有精神方可使国民负载武器。”在德国物质建设发达，固祇在精神的建设。中国则两者有同等的价值。所以上面已述及“铁”与“血”重要的原理，今后我们除实行经济统制外更当用统制的方式训练国民的精神，实行一切思想文化的统制。

所以，今后我国的思想界，一定要主张在精神上实施统制，扫除过去个人主义，狭义的自由主义，“独善其身”，“傲骨凌凌”，“卓立不群”，……等缺乏组织，缺乏统一，缺乏服从的民族劣根性。换言之，即是物质方面是经济统制，思想方面是文化统制，思想统制。打破一切的自由主义，而实现统制主义。

第三，是举国一致的集中精神。过去中国思想界，是“农村经济”反映的文化。因此“礼教”的个人和宗法观念，以及“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部落思想，非常发达。而缺乏社会组织和国家观念，当然更不能产生举国一致的精神，也不能共同走一个集中的道路。“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固然为正人君子所反对，可是“处士横议”“讥弹朝政，”却是大家认为高尚。因此造成一种离心的思想。社会上充满着离心的力量。在太平时代，充分地可以显示民主自由的精神，或者“布衣傲王侯”的风格。这种精神和风格在政治上的反作用，即是表现在上的宽宏大量的态度。在野的也表现安贫乐道，不可苟同的品性，但是一旦野蛮人的侵入，即没有方法去抵御。“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还是“不得免焉”。只好退而迁居岐山。这个是最早的退让的故事。以后“干载琵琶作胡语”，退而采用子女玉帛的方式。最后则“中原衣冠，论于异族”——这个是农业文化缺乏组织的举国一致的精神，不能抵抗外来势力的侵袭，可以说已经达到顶点。而且以前外来势力，是文化低的野蛮人势力，而现在的外来势力是代表金融资本主义的文化而具有举国一致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的集团。假定我们还是保持着固有的意识形态，散漫零乱，绝对的非灭亡不可。所以今后思想界的第一个任务，即是要如何发展举国一致的精神，提高国家，民族，社会的“有机构成程度”，使整个的国家，民族，社会高度的“有机化”。加强国家，民族的向心力量，而灭绝一切的离心力量。

上面所述各点，相信是现在一般人士至少大多数人士的共同认识。如此向前努力，自然民族第一主义的思想树立起来了。还需要什么政治斗争，也不会有什么斗争，更不需要什么思想争斗。假定我们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一味的高谈思想斗争，文化斗争，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不仅不能把我们的思想和文化阵线统一起来，反即拆散了我们民族统一。自然也摧毁了我们民族抗敌的力量。不知不觉作了敌人的汉奸，思想上的汉奸。有志的人们，希望严重的注意！

一九三七，六，卅，南京

（原载《中国社会》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七月出版）